



## “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及反思——中国与 世界之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倪滕达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4) 03-0122-05

2014年6月22日至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与台湾辅仁大学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现代化、全球化与本土化及反思——中国与世界之关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学术演讲厅召开。北师大历史学院和辅仁大学历史系的几十位教师出席了会议。参会学者分成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历史教学三个讨论组,共提交论文49篇。两岸学者介绍了各自近期的研究成果,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研讨会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出席此次会议的各位专家,分享了他们近日在学术研究上的收获。在中国历史讨论组,围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进行探讨的,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帆、汪高鑫、张昭军三位教授,以及李锐副教授。李帆教授的发言《学术史研究的若干省思》,首先从学术史是什么,以及学术史与其他领域的区别两个角度探讨了学术史的概念;接着从外在环境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两个方面,分析了90年代以后人们把重心从思想转向学术,学术史再次成为显学的原因;最后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应有两大特点:一是多元化,二是带有西方色彩。汪高鑫教授探讨了《周易》与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史学与易学自古便有不解之缘,从先秦开始,历代史家大多通晓《周易》。易学与史学以三种模式相互影响,即以史证易、以易说史和以易解史。指出《周易》的整体思维启发了传统史学的“究天人之际”;通变思维启发了“通古今之变”;“一致百虑”的思维则启发了“成一家之言”;“忧患”思维与历史的借鉴思想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李锐副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为《上古史研究的反思——兼论周人古史系统的转变与礼制的变化》。他认为近现代的上古史研究者皆以为自己在探究上古史的“真相”,事实上多数人所面对的只是周人三次古史系统变化及其后战国时期古史系统的某一侧面而已,真正的上古史已经不可“复原”。但了解周人古史系统的变化,特别是其背后的礼制、政治变化,对研究上古史会很有帮助。张昭军教授的发言,简述了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产生过程,肯定了《宣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深刻分析了《宣言》与中国学术转型的关系,认为《宣言》将中国学术历史化、对象化,指示了中国学术转型的方向,即科学化,提出了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整理和解释国学材料,因此,重温《〈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对时下涌现的新“国学”热潮定会有所启示。

[收稿日期] 2014-07-20

[作者简介] 倪滕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中国史组学者的讨论也涉及了文献学领域。北京师范大学的罗新慧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为《清华简〈说命〉篇再议》,该文比较了清华简《说命》与伪古文尚书《说命》篇,对两者的材料来源进行了初步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的罗炳良教授在会上向学者们介绍了清代学者朱兰所撰的《南江先生年谱初稿》的相关情况,对朱兰其人与《南江先生年谱初稿》的沉浮过程进行了简要说明,详述了朱兰嫡裔朱炯总结的该《初稿》所具有的三大价值,即完善了邵氏的生平和任职情况,丰富了邵氏的交游情况,补充了邵氏文献的内容,肯定其为后人编撰邵晋涵年谱的开山之作。北京师范大学的姜海军副教授讨论的题目是《〈四库全书〉编纂与清学范式、文化认同的建立》。他指出,清朝统治者为使中原精英阶层认同其政权合法性,积极接纳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在乾隆时期,为实现思想文化统一,清廷借编纂《四库全书》,建构了以考据学为基本表现形式,以程朱理学为价值标准的学术新范式——清学。而清学又在《四库全书》的推动下,促成了清中后期的文化大一统,由此强化了清朝政治的大一统。辅仁大学戴晋新教授就傅斯年《检校清史稿初步述略眉识》的稿本与内容进行了识读整理,对照吴宗慈的《检校清史稿初步述略》相关文字,完整披露了《眉识》的内容,并对其价值做出评估。认为虽然傅斯年曾撰有书面意见《关于清史稿事敬述所见》,但《眉识》较《所见》涉及内容更广、更真切,能够印证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反映其学术立场、民族立场与政治立场。北京师范大学周文玖教授在会上阐述了陈垣《日知录校注》的成就,认为《日知录校注》是陈垣先生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对顾炎武的《日知录》所做的校勘和注释,后经人整理成书。此书的主要成就是注明了《日知录》的引文出处,解决了《日知录》在刊刻、校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最大限度地恢复了顾炎武《日知录》的原貌。

在社会史方面,辅仁大学陈识仁副教授探讨了佛教经典中的睡眠观。他以佛经中的相关记载为切入点,考察了佛教对睡眠的基本态度,发现佛教经典普遍主张睡眠不宜过多、过长。早在释迦牟尼传道的原始佛教阶段,相关指示就已屡屡出现。随着僧侣教团的扩张,一套与睡眠有关的理论发展出来。认为若将佛教僧侣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加以观察,可发现他们大多存在刻意减少睡眠,以及睡眠焦虑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朱汉国教授在会上展示的文章题为《从女子离婚诉讼案看民国女性的婚姻觉醒与困境》。指出民国年间频发的离婚诉讼案,反映了民众婚姻自由观念的滥觞。其间女性诉离案的频出,尤其是女性对丈夫重婚和家庭暴力的不断起诉,体现了婚姻中女性的觉醒。而女子诉离的原因,则说明民国时期女性希望一夫一妻制得到落实,获得和谐、平等的夫妻关系。但此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又无奈地显示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

在文化史领域,学者们的讨论涉及了古代历法、报刊出版、近代民族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内容。北京师范大学赵贞副教授提交讨论会的文章为《中古历日社会文化意义略说——以敦煌吐鲁番所出历日为中心》。该文指出中古时期的历日有官修和私造之别,官修“新历”由太史局官员编定而成,每当官颁历日不能及时送达地方,民间便会私造历日。从形制的角度看,中古历日又有繁简之分,简本历日以朔日甲子为序,或逐日排列,或以二十四节气为序进行编排,总体没有吉凶标注;繁本历日也是逐日排列,但每日大致都有吉凶神煞、宜忌事项、日游和人神位置的说明,总体呈现出择吉避凶的宜忌特征,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时间指南。北京师范大学孙燕京教授在讨论会上简述了自己近期的学术成果,回顾了《辛亥革命之际满蒙权贵的政治心态》、《逊位前后满蒙权贵的政治心态》和《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三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孙教授还分享了自己近来思考的一些问题,她对清末十年乃至甲午战后十七年清最高权力集团的政治心态进行整体考察,提出了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辅仁大学刘文宾助理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为《从〈上海租界〉看近代中国对国家主权观念的认知》。该文探讨了上海租界土地永租制的形成,分析了永租制的性质,并且从国际法的角度考察永租制,指出中国对上海租界土地坚持只租不卖,说明当时的涉外官员对国际法是有一定认知的。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的论文《近代的文化危机、文化重建与民族复兴》,首先分析了国人文化危机意识形成的过程;随后评述了新文化运动之后两次影响深远的重建民族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和“全国文化建设运动”,以及与此二运动相随的文化论争;最后总结了近代中国志士谋求民族文化发展的探索之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指出近代国人思考文化问题虽历经艰辛,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辅仁大学高郁雅副教授提交讨论会的文章名为《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新闻报〉之研究》。该文以“生存考虑”代替“忠奸二分法”,考察了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办报环境,分析了在战争爆发、城市沦陷、政权更迭的情况下《新闻报》在民族气节与市场运营两难间的挣扎与抉择,指出战后该报为其战时的错误行为付出了政治代价,而其与汪伪及国民党政权的勾结,则反映了战时商业报纸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宁欣、倪玉平两位教授将参会学者的目光吸引到了经济史领域。宁欣教授就唐德宗时期的财税新举措进行了考察分析,指出这些新举措为时人及后来者所抨击,不仅受到朝臣的反对,还引发了商贾和市民的不满,甚至反唐的藩镇叛兵也打着废除新举措的旗号笼络民心。认为新举措虽然半途夭折,但其推行过程中的多方争利现象,及其体现的财税征收的新趋势值得重视。倪玉平教授展示的论文题为《有量变而无质变:清朝道光时期

的财政收支》。该文认为“道光萧条”说值得商榷,应将其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其理由是道光时期地丁银始终是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其它各项收入虽有波动,但影响有限。这表明即便此时中国已开始迈向近代社会,其基本财政收入格局并未发生改变。指出当时清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力已降至极低水平,即便发生巨额支出,也仍靠临时调补来支持,可见统治者缺乏长远打算和全局思维。由此断言,即使没有发生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清朝的财政体制也到了必须全面调整的时候。

中国史组另有一些专家学者,针对本专业当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展开了讨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黄国辉和陈涛分别展示了题为《〈首阳吉金〉“鬲簋”补释》和《“文房四宝”源流考》的文章。黄国辉指出,最近公布的《首阳吉金》“鬲簋”铭文中“诸子具服”,应指滕公子弟就其职位,服其职事。“兴”该释为“同”,与其前文的“凡”字相对应。铭文“朕臣”不仅包含鬲等参事人员,还包括了“诸子”。“小臣避鼎”为“鬲簋”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参照。陈涛的文章详细考证了“文房四宝”的形成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房四宝”的萌芽阶段;初盛唐时期“文房四宝”初步形成;中晚唐时期“文房四宝”正式确立;宋代“文房四宝”的名称已经多元化。指出南宋时期“文房四宝”之名开始流行,清以后“文房四宝”之名则已广为通用。来自辅仁大学的陈方中副教授在讨论会上总结了天主教会对抗战事业的贡献,列举了著名天主教徒马相伯、于斌、雷鸣远等人的爱国举动,指出“爱国”是民国时期已经本地化的中国教会的重要特征。辅仁大学林桶法教授的发言则探讨了蒋介石日记中的人物臧否。该文分析了蒋介石日记的性质,认为蒋日记中确有个人心情写照,但亦有其不实之处,因此学者在使用过程中应当谨慎。接着举例考察了蒋介石日记中的人物评价,指出日记中的人物臧否反映出蒋介石性格内向,有意强调自己高于群众,保有统治者的权威。文章认为蒋介石是一位传统儒将,重视领导权威,其决策多来自个人决断,有时是碍于一些派系的坚持才做出妥协。辅仁大学克思明教授展示的论文题为《中国领袖 21 世纪的党建论述:所谓“新三民主义”的历史反省与考察》。该文首先依时间顺序和历史脉络梳理了“新三民主义”的演变过程,接着考察了中共领袖在党建过程中关于“新三民主义”的论述,指出孙中山并没有提出“新三民主义”一词,“新三民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毛泽东创造的。而 2002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针对领导干部,首次公开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说法,虽然后被人们称为“新三民主义”,但与历史上的“新三民主义”不同。

## 二

世界史组的与会专家,也展示了很多具有创新性的文章,就诸多问题给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史学理论方面,学者们均各抒己见,围绕很多重要课题积极展开讨论。北京师范大学董立河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历史理性与史学实践:从现代、后现代到后-后现代》。该文详细论述了历史理性与史学实践从现代发展到后-后现代的过程,指出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前,史家通常在两个前提下书写历史:一是历史的进步性、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二是语言再现历史实在的可能性。但 70 年代后,西方史学进入后现代时期,历史学家曾坚信的那两个前提此时被推翻。为了避免历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遭到颠覆,从本世纪初开始,一批史学家开始研究后-后现代史学,在承认现代史学家完全重现历史的梦想存在问题的同时,也明确后现代对史学的完全否定过于极端。北京师范大学的蒋重跃教授从语言文字、文化传统、思维方法、史书编纂、历史理论五个方面,提纲挈领地阐述了中国学者研究并撰述世界历史时应注意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挑战。指出中国学者如果在历史写作过程中对文字、文献、理论等因素都思考得更加透彻、深入的话,那么所产出的作品就一定更为精彩。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教授以《希罗多德〈历史·序言〉的史学解析》为题发言,挖掘希罗多德《历史》序言的本质内涵,重新审视希罗多德的研究对象,探索希腊史家独立精神的起点。指出从本意上说,希罗多德的“ἱστορία”一词与“历史”无关,它是一种认知方法,是探研和究诘的结合。后来的希腊史家修昔底德、色诺芬虽然没有继承希罗多德“ἱστορία”的认知方法,但亚里士多德及其学生特奥弗拉斯图斯却使用这种方法,分别撰写了《对动物的探研究诘》和《对植物的探研究诘》,他们是希罗多德真正的后继者。北京师范大学唐利国教授的报告《民族国家的创立与自由主体的形成:丸山真男的日本民族主义论》,在梳理丸山真男的民族主义论的展开过程的基础上,探索其学术研究的方法,以及其民族主义论的思想史意义。该文指出丸山真男的民族主义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关于日本“前期国民主义”的研究,关于明治日本的“国家理性”与昭和日本的“超国家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重建健康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的探索。认为丸山真男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敏锐的时代关怀,并能将二者与严谨的学术研究相结合,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辅仁大学张四德教授介绍了近年美国清教史学研究的情况。探讨了 17 世纪以清教主义为核心的新英格兰文化体系与 17 世纪以降美国主流文化的关系,分析了在清教社会群体建立之后的三十年里,哈佛大学涌现出诸多清教研究者的原因,解释了为何多数研究清教的史家并非出身新英格兰,强调哈佛大学能够在移民族群史以及清教主义研究上表现突

出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有容乃大”的格局。

社会史是吸引学者们展开热烈交流的另一重要领域。北京师范大学郭家宏教授深入考察了19世纪英国的民间慈善救济活动,描述了这些慈善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分析了民间慈善活动的思想与社会根源,阐明了工人阶级的互助与自助在慈善救济中发挥的作用。指出19世纪英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除了源于英国的慈善传统外,与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阶级结构的变化也密切相关。慈善事业的发展,弥补了国家在社会救济方面的不足,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是19世纪英国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但由于这些慈善事业的目的是救助所谓“值得救助的人”,因而善款并没有完全发放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工人阶级的自助和互助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身的痛苦。辅仁大学讲师袁小涓阐述了20世纪初美国女权人士艾利斯·保罗,为争取女性解放的奋斗历程,指出艾利斯·保罗对英国激进策略加以扬弃,并于1913-1920年力促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赋予了女性投票参政的权利。辅仁大学周雪舫教授提交的论文题目是《普立兹奖得主杜兰蒂与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该文以“加拿大乌克兰人民自由协会”于2003年5月发起的要求“普立兹奖委员会”撤销杜兰蒂所获奖项一事为线索,探讨了1932-1933年乌克兰发生的大饥荒的背景与实际状况,以及当时西方对乌克兰大饥荒的看法。指出乌克兰大饥荒属于当代乌克兰人集体记忆的一部份,乌克兰官方与学者强调此次大饥荒属于“人祸”,揭发此事的目的在于追求历史真相,使后人不再遭受此类灾难。

针对世界史领域当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学者们也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展现了开阔的学术视野。辅仁大学助理教授郭容吟对学界常见的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的原因一一提出质疑,如传统说法推断英国的政治环境如议会制度等有利于促成工业革命,她则指出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如荷兰、法国,也都有议会制度。此外,英国也并非欧洲唯一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便利的水陆交通,经历过农业革命,或者拥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国家。辅仁大学助理教授萧道中分析了一战后协约国未能召开法庭审判前德皇威廉二世的原因,指出由于对国家元首的控诉并无前例,因此该案在法律基础上存有不足。而且威廉二世已于停战前逃往中立国荷兰,所以协约国面临复杂的外交与法律引渡问题。同时,随着战后局势的转变,协约国内部就是否要不计代价地追捕威廉二世也难以取得共识。辅仁大学助理教授杨小华分析了美国现代音乐家约翰·凯吉的无声作品《四分三十三秒》产生的原因及其进化的过程,认为凯吉受到东方哲学,如易经、道教及禅宗美学的强烈感染,并将其对东方哲学的理解融入到了音乐创作中。同时,凯吉的早期成长背景与创作经历也对其作品产生了深远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提交讨论会的文章是《塑造“苏联形象”:越南战争中的苏联军事专家及其影响》。该文指出,在越南战争期间,有一万余名苏联军事专家和军人赴越参加抗美军事行动,这些苏联军事专家在越南的言行和工作业绩既代表了“苏联人形象”,也代表了“社会主义制度形象”。苏联军事专家刻苦耐劳、勇于牺牲的精神和精湛的技术,让越南人钦佩。而他们在越南的出色工作,及其提供的巨额援越物资,促进了越南对苏联人、苏联社会和苏联制度的了解和亲近,也为战后越南全面倒向苏联提供了前提条件。

### 三

本次会议有关历史教学的探讨,涉及中学历史教学问题和大学历史课程设置两方面。在中学历史教学问题上,学者们分享了各自近期的研究心得。北京师范大学郑林教授讨论了中学探究式历史学习课程的内容选择和编排方法。他指出探究式学习要求学生像历史学家那样去体验、感受历史研究的过程,形成对历史的叙述或评析,并用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达出来。认为要推广探究式学习,需做到教学课时与研究内容匹配,所选内容与学生兴趣和认知能力相符,而且内容编排要体现探究的思路和程序。北京师范大学讲师侯桂红的发言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即历史教学设计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对此给出的建议。指出目前历史教学设计研究者主要是中学历史教师,研究内容多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并且存在概念、理论混乱的现象。认为出现上述问题有历史学科自身的原因,如历史教学设计的研究群体结构单一,与教学设计研究的需求不匹配等;也有外部原因,如教学设计研究理论脱离实践,我国教学设计的本土化水平较低等。最后建议研究者们在未来的工作中,学习相关的教学设计理论,深刻领会并有意识地实践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遵循教学设计的核心原则。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李凯提交讨论会的文章题目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学生自主发问》,认为在新一轮教改环境下的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自主发问有其必要性。鉴于学生已拥有不少经验与知识,老师应该搭建支架把学生从已有水平提升到更高水平,在检索资料、分析问题、形成认识的过程中,与学生合作,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老师的引导作用。

在大学历史课程设置方面,学者们也给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北京师范大学耿向东教授发言的题目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生教学改革漫谈》。该文回顾了白寿彝先生主持的北师大历史系本科生课程改革的历史背景

和过程,详述了白先生教学改革的具体措施,指出此次改革极大地完善了本科生的知识结构,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强化了学生的学术思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本科生教学改革对其他高校,特别是师范类院校的历史学专业改革起到了引领和促进的作用。辅仁大学周梁楷教授以《从“史学史”到“历史意识的演变”:一门知识和课程的转型》为题进行了发言。周教授指出,随着史学现代性的建立,“史学史”在19世纪末已被视为一门重要的知识和专业课程。然而,“史学史”的研究取向不断变换,尤其是从70年代初“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对历史研究及其理论带来巨大影响,甚至颠覆了“史学史”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今“史学史”本身面临转型,他本人也已将原来讲授的“西洋史学史”变为“传统西方史学意识”和“近代西方历史意识”。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务员刘瑶分析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课程设置的特点。首先阐明了历史专业应当培养何种人才,并给出了培养方案。随后指出北师大历史学院除基本教学外,还设置了一系列特色课程,其中包括科研训练与创新活动、历史学前沿讲座和教师教育类课程等。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吴琼就其中一门特色课程——影视史学进行了说明。首先提出历史是有关过去影像的研究,进而探讨了历史影像的来源问题。同时指出影像史学对影像材料的分析和解读与传统史学有根本性区别,影像语言有自己的语法特征和内在逻辑,历史影像资料的分析,因受到编导思路、摄影方式、技术水平、艺术观念和学术素养的影响,得出的结论差别巨大。

在这次会议上,海峡两岸史学工作者济济一堂,就史学研究与历史教学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深入的交流让与会学者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正如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林桶法教授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所期望的那样:辅仁历史系北京之行使两校同行在学术研究上更上一层楼。会议的召开对促进两岸学术交流,增进北京师范大学与台湾辅仁大学的深厚友谊,有深远的意义。

(责任编辑 汪高鑫)

## 稿 约

一、本刊欢迎有关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等方面发展史研究的稿件。

二、文稿长短不拘,“史林偶拾”请写简短些,集中写一个问题。本刊对来稿有时须作必要的修改,如不愿修改,请说明。作者文章文责自负,不代表本刊对问题的看法;一定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令的规定,坚决反对剽窃、抄袭的行为。

三、来稿请用16开小稿纸,打印稿用A4纸,注释请用脚注,即注于每页之下。文稿字迹不清,或注释不合要求,本刊请人誉写、处理,费用从作者稿酬中扣除。

四、本刊从2000年第3期起,实行匿名审稿制。来稿请附作者情况介绍,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籍贯、身份证号码、职称、工作单位、研究方向、详细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但应另纸书写,正文与注释中不能出现与作者背景有关材料。来稿请寄《史学史研究》编辑部,不要寄给个人。务请作者遵守上述要求。

五、来稿请附200至300字的中英文摘要。引文一定要核对原文,做到准确无误。

六、来稿发表后,即寄付稿酬。请作者自留底稿,未被采用的文稿,不再退还。作者寄来的稿件如半年未被采用,也未接到本刊编辑部的函件,可自行处理文稿。从1997年起,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和中国期刊网,如作者不同意录入,请说明。